第 63 卷 第 3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63, No. 3
2026 年 5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y 2026

中国思想史研究

文本与天道:孟子“孔子作《春秋》”说的知识与思想

曹 建 国

(绍兴大学 鲁迅人文学院,浙江绍兴 312000)

摘　要:《孟子·离娄下》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历代学者从各种角度对此进行了讨论。究其实,这一命题既非历史学问题,亦非文献学问题,尤其不是《诗》与诗学的问题,而是关乎孔子圣化的思想史命题。孟子以历数推演天命,坚信有圣德者当建新朝。孔子乃圣之时者,其圣德上接文王,以《春秋》承续《诗》,此正是“斯文在兹”之事。孟子言《春秋》为“天子之事”,其本意当然不是指孔子为现实的天子,而是强调孔子以《春秋》传达天命的合法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包括孟子以及其他诸子所提出的许多道德与政治命题都与“作为基础和背景的东西”的方术知识相关联,体现出早期中国话语体系与思想价值建构的独特性。

关键词:“《诗》亡”;“孔子作《春秋》”;文本;天道

中图分类号: K 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6)03-0075-12

李零先生曾言,中国史的研究者“由于史料的欠缺遮蔽了人们的视线,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在诸子百家的下边和这种思想活跃的前面,真正作为基础和背景的东西到底是什么”。① 李氏所言之“作为基础和背景的东西”就是方术知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多思想观念。孟子亦然,其思想和方术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多观念也凭借方术知识构建,比如其“性善”论和“养气”说。② 不惟如此,孟子所谓“《诗》亡”说亦以数术知识为背景展开,文本作为承传天道的载体被着力强调。但此前关于“《诗》亡”说讨论多围绕《诗》与《春秋》如何承续的一些技术环节展开,比如《诗》何时亡而《春秋》何时作,对于孟子此说的知识背景及思想史意义则甚少措意。本文欲就此略作申说,并就教于方家。

一、何谓“《诗》亡”

《孟子·离娄下》云:

>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③

这段话看似易懂,学术史对其解读却聚讼纷纭。而要厘清这个学术纷争,至少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是“《诗》”而不是“诗”?何谓“《诗》亡”?《诗》本存在何以又谓之“亡”?

收稿日期: 2025-04-10

作者简介: 曹建国,绍兴大学鲁迅人文学院教授。

* 徐兴无教授、刘雅萌副教授提供了大量建设性意见,匿名审稿人也提供了专业细致的审稿意见,谨致谢意。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出土文献与《诗》本早期书写及经典化研究”(23AZD007)阶段性成果。

① 李零:《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2 页。

② 曹建国:《孟子学说的方术背景:以“性善”和“养气”为中心》,《饶宗颐国学院院刊》第五辑,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8 年版,第 217—249 页。

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95 页。

孟子说的“诗”是文体之“诗”还是文本之“《诗》”? 古今学者大体是从文本意义界定的,“诗亡”即“《诗》亡”。但仍有学者统计《左传》《国语》用诗与《诗》的关系,证明“诗亡”即诗歌创作的消亡。① 究其实而言,将“诗亡”之“诗”理解为文体之“诗”,可能不大切合孟子时代的实际。诗关乎人情,无论政治如何变迁,其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严格说,《左传》《国语》引诗、用诗多出自《诗》,这只能用于说明春秋时期《诗》及其价值功能的转向,而不能以此认为《诗》外无诗。所以孟子这段表述中的“诗”不适合解读为文体之“诗”,应当是文本之“《诗》”。

那么,何谓“《诗》亡”呢? 概言之,其说有三,即“颂声亡”“《雅》亡”和“《风》《雅》《颂》俱亡”说。

“颂声亡”说始诸赵岐。其《孟子章句》曰:“王者,谓圣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颂声不作,故《诗》亡。”②其又言这一章的章旨:“诗可以言,颂咏太平。”焦循疏曰:“宣公十五年《公羊传》云:‘什一行而颂声作矣。’注云:‘颂声者,太平歌颂之声,帝王之高致也。’”③据此则赵岐所谓“颂声”当指正诗,亦即颂扬之声,包括《周颂》及正《风》、正《雅》之诗。④ 故王夫之《四书笺解》曰:“‘王者’,统三王言之,‘迹’,其已然之德业……文、武、周公之德泽既斩,故列国之诗傲僻淫荡,而《雅》《颂》之以达庶物之情,敦人伦之谊,涵泳仁义之泽,以兴庶民,使异于禽兽者亡矣。”⑤既是文、武、周公之德泽,则“诗”只能是《周颂》及正《风》、正《雅》。当然,“颂声”还存在一种解释。亦即时政衰弊,但王迹不熄,采风不辍,文武之诗颂于朝堂,如祭公谋父诵《时迈》止穆王观兵之心。如此,则“颂声”即“诵诗”,“诗亡”即“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⑥之义。

“《雅》亡”说始于王通。其《中说·礼乐篇》曰“《小雅》尽废而《春秋》作矣”,《王道篇》曰“王国之有《风》,天子与诸侯夷乎? 谁居乎? 幽王之罪也。故始之以《黍离》,于是《雅》道熄矣”。⑦ 其所谓“《雅》道熄”即“《诗》亡”之义。到了宋代,“《雅》亡”说被进一步推阐并渐成“《诗》亡”说的主流。先有二程倡“王者之《诗》亡、《雅》亡,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⑧,继之有杨时,曰:“春秋之时,《诗》非尽亡也,《黍离》降而为《国风》,则《雅》之诗亡矣。《雅》亡则无政,《春秋》所为作也。”⑨而胡安国亦曰:

> 《邶》《鄘》而下多春秋时诗也,而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何也? 自《黍离》降为《国风》,天下无复有《雅》,而王者之诗亡矣。《春秋》作于隐公,适当《雅》亡之后。⑩

杨时、胡安国都试图在《诗》与《春秋》之间建立关系,但杨氏强调“无征”,胡氏则强调两者时间承续的“适当”。朱熹综合前说,其《孟子章句》曰:“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⑪随着朱熹地位渐隆,其说也成为“迹熄诗亡”最权威的解读,后世多承其说。

“《风》《雅》《颂》俱亡”说肇端郑樵。郑氏质疑胡安国的“《雅》亡”说,认为“美刺之诗亡而褒贬之

---

① 杨子怡:《先秦用诗与中国文化的诗性思维》,《诗经研究丛刊》2004 年第 2 辑,第 205—229 页; 杨兴华:《孟子“诗亡”之论新解》,《学术论坛》2007 年第 8 期,第 100—102 页。

② 焦循撰,沈文倬校点:《孟子正义》,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572 页。

③ 焦循:《孟子正义》,第 577 页。

④ 这牵涉另一个问题,即汉代三家《诗》学有无“正变说”。以往学术史认为三家《诗》学无“正变说”,而根据最新出土的海昏侯墓《诗》,可以肯定三家《诗》学有“正变说”。

⑤ 王夫之:《四书笺解》,《船山全书》第 6 册,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年版,第 326—327 页。

⑥ 班固:《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756 页。

⑦ 张沛:《中说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173、26 页。

⑧ 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93 页。

⑨ 朱熹:《论孟精义》,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 7 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37 页。

⑩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第 1 页。

⑪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295 页。

书作矣,非有定义”。① 既然“美刺之诗亡”,则自然包括《风》《雅》《颂》。而王柏《诗疑·诗亡辨》则对二程、杨时以及朱熹的“《雅》亡”说提出批评,其曰:

>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集注》曰:“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此朱子本程子、杨氏之说,而赵岐未有此论也。二说本甚密,以之释孟子之言,妄疑其少疏也。……
>
> 孟子之言,实二经始终之要,亦义理之所关也。若谓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则《雅》者自为朝会之乐,《春秋》自为鲁国之史,事情阔远而血脉不贯。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非曰王者之诗亡也。凡言《诗》,《风》《雅》《颂》俱在其中,非独以《雅》为诗也。②

王说虽甚辨,但朱熹地位尊崇,王柏也难以动摇朱说。到了明代,解《孟》者试图突破朱说,故王柏的观点渐为学者接受,如袁黄的《诗亡辨》便明确指出“所谓《诗》亡者,岂独指《雅》,而《风》与《颂》不在内耶”?③ 到了清代,接受《诗》亡即《风》《雅》《颂》皆亡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如李光地《诗所》辨正《黍离》以下《王风》诗篇和《节南山》等《雅》关系,认为二者皆平王时诗,“《诗》亡”即《风》《雅》皆亡。④ 而顾镇《虞东学诗》云:“《诗》者,《风》《雅》《颂》之总名。无容举彼遗此。若疑《国风》多录东周,《鲁颂》亦当僖世。”⑤现代学者也多取《风》《雅》《颂》三体皆亡说,注《孟》之书如杨伯峻《孟子译注》,⑥文学批评著作如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等皆如此。⑦

但令人困惑的是,作为文本的《诗》传承至今,孟子何以谓之“《诗》亡”呢?究其实而言,孟子所谓“诗”或与《诗》本无涉,更主要指与《诗》相关的周代礼乐制度,甚至广义的“周道”。依据文献记载,无论是士大夫献诗还是行人采诗,这些作品一旦进入大司乐或大师等王官政教系统,便会成为《诗》的一部分。而一旦雅乐制度废,新的诗不再进入王政系统,《诗》本便不再扩充。尤其是旧有之“《诗》”也丧失“言”的功能,失去其乐教与诗教的意义,则《诗》可谓之亡。诚如是,孟子“迹熄诗亡”表述中的“迹”字便至关重要。对此,前人已有所留意,朱熹曰“王者之迹熄”乃是孟子此段的“道理紧要”,⑧王柏也认为“‘迹熄’二字包含有味”。⑨ 顾镇亦认为“所欲究者,王迹耳。王者之迹,何预于《诗》?《春秋》之作,何与于迹。此义不明,则不独《黍离》降《风》支离难据,即迂仲、鲁斋、安溪诸说,亦可存而不论”,故其“《诗》之存亡系于王迹之熄与不熄,不系于本书之有与无也”说尤为通达。

然则何谓“迹”?朱熹以“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为“王者之迹熄”,王柏则以“天子巡狩,太师陈诗”说“王迹”。后世虽多采信朱说,但信从王柏的亦不乏其人,如袁黄《诗亡辨》曰:“孟子所谓‘迹熄’者,乃平王东迁,不复巡狩,王者之辙迹不行于天下也,非泛指政教号令也。”⑩顾镇曰“盖王者之政,莫大于巡狩述职,巡狩则天子采风,述职则诸侯贡俗。太师陈之,以考其得失,而庆让行焉,所谓迹也。……洎乎东迁,而天子不省方,诸侯不入觐,庆让不行,而陈诗之典废,所谓迹熄而《诗》亡也”。⑪

但无论是以“政教号令”还是以“天子巡狩,太师陈诗”说“王者之迹”,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何以东周

① 参见何焯撰,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8页。
② 王柏:《诗疑》,《续修四库全书》第5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
③ 袁黄:《诗亡辨》,黄宗羲编:《明文海》,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42页。
④ 李光地:《诗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页。
⑤ 顾镇:《虞东学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册,第383页。
⑥ 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2—193页。
⑦ 顾易生、蒋凡:《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⑧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50页。
⑨ 王柏:《诗疑》,《续修四库全书》第57册,第230页。
⑩ 袁黄:《诗亡辨》,黄宗羲编:《明文海》,第1142页。
⑪ 顾镇:《虞东学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册,第383页。

以后仍有《风》诗产生的问题。王柏谓《风》诗得之于乐工传诵，自然和他不信《诗序》的思想有关，但这并不能遮蔽大部分《风》诗产生于平王东迁之后的事实。顾镇"不系本书之有与无"虽能畅达于思想史语境，但同样也不能消除"《国风》多录东周，《鲁颂》亦当僖世"的疑虑，只能寄望"好学深思之君子，尚有以诲予不逮"。而杨椿甚或以"霸者亡而王迹熄"，试图解决《风》诗年代学的问题。① 所有这些，似乎都可以看作是人们对以"巡狩""陈诗"解说"迹熄诗亡"的焦虑表达。而激烈如王夫之者，甚至直接否定了"迹"与辙迹的关系，曰"至有谓'迹'为巡守之车辙马迹者，尤劣。巡守亦周制之一端耳"。② 缘此，朱骏声便尝试以"迒"释"迹"。其《说文通训定声》曰："迒，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从辵从丌，读与记同。"认为《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迹"盖"迒"之误字。③ "迹""迒"形近，自然存在讹误之可能。朱骏声以采诗说"迒"，于文献亦有征。传世文献如《左传》襄公十三年、《公羊传》何休注以及《汉书·食货志》等记载采诗，出土文献如上博简《孔子诗论》论《邦风》"溥观人俗"④也是采风之义。不仅如此，以"迒"说"迹"也有较强的阐释力，尤其是人们借此便不用再纠结于平王东迁及巡狩省方之事。遒人为行人属官，《周礼》大行人职掌"间问以谕诸侯之志"，即"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頫，五岁遍省；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间"即"岁""三岁"等，而"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郑玄注："七岁省而召其象胥，九岁省而召其瞽史，皆聚于天子之宫，教习之也。"孙诒让认为此即行人召集诸侯国象胥、瞽史等聚而教习言语、辞命、书名和声音等。⑤ 因此关乎诗乐，亦当和采诗有关。而"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只是天子行政之一，并不需要将《诗》之存亡完全系于巡狩。同时，依据《公羊传》何休注，诸侯《风》诗进入王政体系经过多道程序，其中最后一道是"国以闻于天子"。诸侯虽然有诗，但不闻于周天子，对周王室而言亦可谓之"《诗》亡"。所以顾栋高等人谓平王东迁而政声未绝，惠、襄之后王室衰微也不为无据。征之于《诗》，《诗序》以《陈风·株林》为陈灵公诗，约当公元前 600 年前后，与顾氏所论年代相仿佛。故采诗制度废，王政不行于天下，《诗》篇便不再扩充。与此同时，"王者"也无庸系于时王，谓之圣王遗泽即可。故朱骏声谓"迹"即"迒"颇能自洽，此后注《孟》者也大抵宗其说。⑥

当然，无论是"政教号令""天子巡守"还是采诗，都是基于字面义或止于一端，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更广义的"周道"，亦即孔子一心要恢复的周礼，"《诗》亡"预示周道衰微。所以，考察孟子"《诗》亡"不仅需要有历史真实的维度，更应思考其思想史内涵及话语建构的意义。唯有如此，方能真正体味孟子强调"孔子作《春秋》"的深层思考。

二、孔子何以作《春秋》

古今对"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解读纷纭聚讼，但孟子这段话表述的重点却在"《诗》亡而《春秋》作"，即强调《春秋》继《诗》而作。《诗》虽是王者之迹并承载周道，但王迹已熄，周道已坏，代之而起的是《春秋》。此二者并非仅仅是时代的前后相续，更重要的是精神内核的前后承续。然而正如顾镇所问，"王者之迹何预于《诗》？《春秋》之作何与于迹"？⑦ 所以问题的核心是孔子作《春秋》，以及《春秋》与《诗》关系的问题。

---

① 焦循：《孟子正义》，第 572—574 页。

② 王夫之：《四书笺解》，《船山全书》第 6 册，第 326 页。

③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武汉：武汉古籍书店 1983 年影印版，第 181 页。

④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9 页。

⑤ 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2982—2984 页。

⑥ 杨伯峻：《孟子译注》，第 193 页。

⑦ 顾镇：《虞东学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9 册，第 383 页。

“春秋”本史书之通名,与《尚书》《国语》同类,只是记史方法目的不同而已,故《礼记 · 经解》云“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① 春秋战国之时,各国皆有《春秋》,《墨子 · 明鬼下》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②其佚文又曰“吾见百国《春秋》”。③百国《春秋》或称名各异,如《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不管是哪一国的《春秋》,都是各国史官所纪录的各国史事。孔子未曾为鲁国史官,那么孟子为什么要说孔子作《春秋》呢?

欲明“孔子作《春秋》”之事,关键要看孟子此说的具体情境,否则这可能就是个伪命题。《孟子》两次言及孔子作《春秋》之事,分别见于《滕文公下》和《离娄下》。《离娄下》肯定孔子作了《春秋》,而《滕文公下》讨论的是孔子作《春秋》历史背景及其诛赏之功。

孔子是如何作《春秋》的呢? 《离娄下》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将孔子作《春秋》铺排成事、史、义三个层面。

何谓“事”? “事”即历史事件,是史书的内容。就《春秋》而言,其记录的主要是齐桓、晋文等诸侯国君的事迹,故诸侯国间的纷争为《春秋》的叙事核心。与此同时,“齐桓、晋文之事”也构成了孟子言说的时间规定,成为“孔子作《春秋》”说的成立条件之一。但《春秋》所记不限于齐桓、晋文,孟子之所以称述他们,正是为“孔子作《春秋》”张目。

何谓“史”? 朱熹曰: “史,史官。”④这与赵岐曰“其文,史记之文也”⑤意义差别不大,二者都强调《春秋》之文与史官的关联。因与史官相涉,故可称“史文”,它需要依照史的规则去记录、编纂和书写。何种规则,或者说什么样的文谓之史文? 《仪礼 · 聘礼》“辞多则史”,郑玄注: “史谓策祝。”⑥所谓策祝即策书、祝辞,乃史官所掌,具体事例可参《尚书 · 金縢》所记策祝,确乎辞多且重文饰。⑦ 此亦可与《论语 · 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⑧《韩非子 · 难言篇》“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 殊释文学,以质性言,则见以为鄙”⑨等相参。考其原因,朱熹谓“史,掌文书,多闻习事,而诚或不足”,⑩白寿彝亦认为“因为史官要参加宗教活动,他所作的媚神之词,总难免华而不实,是文胜质的”。⑪ 正如《金縢》周公为能“戚”先王,便反复强调武王才能不及自己,下文又不乏威胁意味,试图以此打动先王。不管周公用心如何,但就策祝而言,确实可称“诚或不足”,也有点“华而不实”。而此句“其文则史”意在强调《春秋》之文仍是传统史官的文风,而孔子作《春秋》也因袭其旧文。司马迁《史记 · 三代世表 · 序》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⑫,盖用孟子之说。

何谓“义”? 《说文》: “义,己之威义也。”⑬此训当为“义”之后起义,其字从“我”,其义当与裁断、惩戒有关。根据甲骨文字形,“我”是“刃部有齿的一种特殊的钺形武器”,⑭故有征伐裁断之义。《说文》记录“义”的异形字“羛”,“弗”与“我”相似,也有矫正之义。“义”训裁决、裁断,文献有征。《汉书 · 公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609 页。
②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226—233 页。
③ 浦起龙:《史通通释》,《四部备要》本,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5 页。
④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295 页。
⑤ 焦循:《孟子正义》,第 574 页。
⑥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073 页。
⑦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96 页。
⑧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89 页。
⑨ 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22 页。
⑩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89 页。
⑪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 1 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 页。
⑫ 司马迁:《史记》,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487 页。
⑬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33 页。
⑭ 林沄:《说戚、我》,《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98—205 页。

孙弘传》曰:“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白虎通·情性》:“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①所以,“义”有裁决之用,有惩恶扬善之功。这一点很重要,它表明孔子的《春秋》取义具有惩戒儆惧之功。但需要强调的是,在孟子的表达语境中,他转述了孔子的话,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因此“义”转化为“取义”,成了孟子这段表述的核心。“取义”不仅关系到《春秋》“义”的呈现方式,也关系到孔子为何作《春秋》,以及如何作《春秋》等问题。那么孔子如何“取义”呢?

首先,孔子通过阐释《春秋》文本取义,亦即因承《春秋》旧文,通过阐释赋予其政治、伦理等意义。徐兴无说:“孔子或者儒家开始阐释这种年代记的行为,其目的在于从中‘取义’,阐释历史,借此建构一个以社会为中心的道德秩序和政治权威,使‘乱臣贼子惧’。”②《春秋》三传中有诸多冠名“君子曰”的内容,其实即为“取义”。如《左传》成公二年,新筑人于奚因为救了孙桓子有功,于奚请曲轩、繁缨,卫人许之。对此,孔子评价曰:“惜也! 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③孔子的评语便是取义,被用于《左传》文本中,与《左传》叙事一样承担建构职责。《公羊》《谷梁》也是如此“取义”,如《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曹羁出奔陈,“君子以为得君臣之义”。

其次,孔子“曲笔”“笔削”《春秋》旧文以取义。如鲁僖公二十八年,晋侯于温地大会诸侯,并且“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但孔子认为“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故《春秋》经文曰“天王狩于河阳”。对此,孔颖达疏曰:“此传称仲尼之语,即云‘书曰’,明是仲尼新意,非旧文也。杜以‘书曰’为仲尼新意,亦以此而知之圣人作法,所以贻训后世。以臣召君,不可以为教训,故改正旧史。旧史当依实而书,言‘晋侯召王,且使王狩’”。④ 事实上,孔子为了取义,对《春秋》旧文应该做了较多的改动。清人万斯大《学春秋随笔》云:“《春秋》之文则史也,其义则孔子取之。诸史无义,而《春秋》有义也。义有变有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春秋》书之曰‘卫侯衎出奔’。此以变为义者也。”⑤

是故《春秋》有史事、史文、取义,此三者构成“孔子作《春秋》”的话语元素。三者以“义”为核心,同时也相济为用,“有史官之笔,有夫子之笔。史官之笔,谓其事也;夫子之笔,谓其义也。因其事以著其义,而事实矣;明其义以录其事,而义著矣”。⑥ 换言之,无史官旧文,孔子无以取义;无孔子赋“义”,《春秋》仍是旧史文。与此同时,孔子取“义”《春秋》,亦可回答传统经学史争论不休的“孔子作《春秋》”问题。不论是阐释取义还是笔削取义,其实质都是“作”。早期的“作”并不在于形式,书写、口述以及具体行事都可以称为“作”,“作”的关键在于能彰显天道并建构起新的道德体系,故“作者谓之圣”。尽管孔子谦称“述而不作”,但对于孔门后学来说,夫子“述”便是“作”,对于孟子来说尤其如此,这里的“述”其实就是阐释,也就是“取义”。汉代以后对于孔子与经书关系的体认,以及孔子作为圣人的历史定位、“经”的界定等,都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总之,经孔子赋“义”,《春秋》有文有义,文质彬彬,故程颐在《春秋传序》中说:“《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⑦也正因为文辞隐显皆有义,《春秋》成为褒贬之书,并且能让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

---

① 班固:《汉书》,第 2616 页。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382 页。
② 徐兴无:《经纬成文:汉代经学的思想与制度》,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7 页。
③ 阮元刊刻:《十三经注疏》,第 1894 页。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827 页。
⑤ 焦循:《孟子正义》,第 574 页。
⑥ 吕大圭:《吕氏春秋或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57 册,第 478 页。
⑦ 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 583 页。

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①换言之,在孟子看来,春秋是乱世,世道衰微,臣弑其君而子弑其父,乱臣贼子横行天下,所以孔子要作《春秋》。《春秋》有义,能拨乱反正,孔子作《春秋》以褒贬史事,以正人心,这成为孔子作《春秋》的现实需求与内在动因。自此之后,历代论《春秋》者大多主于孟子说,强调孔子作《春秋》的政治建构与文化伦理价值。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表彰孔子作《春秋》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②王充在《论衡·超奇》亦曰:“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③

但孟子除了主张孔子作《春秋》,同时也强调《春秋》继《诗》而作。《春秋》何以能继《诗》而兴? 虽然孔子赋“义”于《春秋》,然《诗》亦有义。《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赵衰推荐郤縠为中军帅时言及“《诗》《书》,义之府”,孔颖达亦曰“禁民为非之谓义,《诗》《书》,义之府藏也”。④ 既然如此,孔子何不取义于《诗》以赓续周道? 而孟子亦强调“《诗》亡”与《春秋》作? 考其缘由,大抵有二。

其一,《诗》义与《春秋》义不同,其取义方式也判然有别。从义的角度看,《诗》义广大悉备。二《南》言闺门之道,《豳风》言农事富民之道,正《雅》言平天下,接诸侯,待群臣之道,《颂》言政成治定,变风变雅言得失治乱。⑤ 所以《诗》是王教政典,是宗周贵族礼乐文明的载体。学《诗》者应该能“达政”,能“专对”,否则虽多无益。此与上文所言《春秋》之史事、史文不同,也和《春秋》褒贬赏诛,补敝起废之功用有别。而从取义的角度看,《诗》义的呈现大抵有歌诗、诵诗、赋诗三种。作为王教政典,《诗》在各类展演过程中,即便是断章取义的赋诗,也都要遵守“类”的规定性,也就是说,其文本意义稳定且具有公共性。⑥ 与此同时,《诗》作为经典,其文本也有较强的凝定属性。这就决定孔子取义于《诗》时要遵从《诗》固有之义的规定性,也要遵重《诗》本。孔子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事父”“事君”,便是强调和维护《诗》固有的伦理与政治内涵。《孟子·公孙丑上》引《鸱鸮》“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然后引孔子论说,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 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⑦由鸟之筑巢延伸至治国理政。《告子上》引《大雅·烝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论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 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⑧也是说“知道”。这就与阐释《春秋》,尤其是删削《春秋》以取义有着本质的差别。⑨ 既然采诗绝迹,王泽不下流,《诗》所代表的政治秩序与制度权威渐被破坏,以孔子代表的儒家一方面通过文本阐释方式,彰显《诗》的王道意义;另一方面通过介入《春秋》文本,尤其是阐释《春秋》文本的方式,直接针砭时弊,以接续王道,承担《诗》的使命。

其二,春秋时期,周道衰微,《诗》代表的秩序与政治伦理也遭到破坏。《左传》中记载了一些歌诗、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272—273 页。

② 司马迁:《史记》,第 3297 页。

③ 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606 页。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822 页。

⑤ 钱穆:《论语新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356 页。

⑥ 程苏东:《从贵族仪轨到布衣文本——晚周〈诗〉学功能演变考论》,《文学遗产》2020 年第 2 期,第 56—68 页。

⑦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236 页。

⑧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329 页。

⑨ 司马迁提出“孔子删诗”说,《诗经》学史对此一直有争议。我们认为此一问题诠释应该有两重视野,一是文献学视野的解读,审视孔子删《诗》具体所指,尤其是司马迁所说的“去其重”,这一指向的孔子删《诗》极大可能是整理《诗》,一如刘向整理图书。二是思想史视野的解读,司马迁标举孔子删诗,一如孟子倡言孔子作《春秋》,皆有话语建构与思想造圣之考量。

诵诗不依旧典的事例;《论语》中,孔子也对“三家以《雍》彻”的行为表达了愤慨。到了孟子时代,聘问歌咏不行于天下,作为仪式文本的《诗》彻底失去了展演的舞台,即便凭借“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的乐家,也只是“但能纪其铿铪鼓舞,而不能言其义”。① 与此同时,《诗》义阐释也面临挑战。西周礼乐制度下《诗》学旧有的大司乐、大师阐释体系被破坏,新的阐释体系还没有完全建构起来,阐释者碎义便词,故咸丘蒙说《诗》“非是”,高子言《诗》“固哉”。② 相对于“王者之迹熄”导致的“《诗》亡”,此时可算是更为彻底的《诗》亡,周道益发寖坏。“《诗》亡”既是制度之亡,也是支撑制度王道的衰微。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然孟子一定要强调孔子“作”《春秋》,“作者谓之圣”,孔子便是新王道的开创者。所以孟子主张《诗》亡,正是为了凸显新“作”,表彰新圣与新王道。正如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所说:“说《春秋》者,须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书,不是钞录一过。又须知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③基于此,孟子才会宣称“《春秋》,天子之事”,其言下之意即以孔子为天子。

三、孔子何以能行“天子之事”

孟子以《春秋》当王法或许尚能为后世接受,以孔子作《春秋》为天子之事颇为惊世骇俗,后人难免为此纷扰喧哗,正如惠士奇《春秋说》所云“诸儒闻之,群起而哗,诡诡欢咋,以为王鲁诚不可,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可乎哉”?所以便有人千方百计曲为之说,如赵佑《温故录》曰:“知《春秋》者,无如孟子。天子,周天子也。”高拱《春秋正旨》曰:“《春秋》乃明天子之义,非以天子赏罚之权自居。”④但孟子明明说《春秋》是孔子所作,是“天子之事”,并未言及周天子。若以字面理解,周天子的史书应该是“周之《春秋》”。若以明天子之义便谓之“天子之事”,则其书多矣,若《孟子》之类亦可谓天子之事,何以不称天子之事?又,若《春秋》明天子之义,孔子何以曰“罪我者《春秋》”,何罪之有?故毋庸讳言,孟子把孔子摆放到天子的位置。赵岐谓“天子之事”指孔子借《春秋》“设素王之法”自然是汉人的说法,“王鲁”也未必然,但孔子借《春秋》赏罚褒贬诸侯,确实与周天子同功。

更为重要的还是,参诸《孟子》其他内容,孟子视孔子为天子更不容置疑。如《滕文公下》,公都子问孟子何以好辩,孟子回答:“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然后举例治乱,尧时洪水,则禹治之;尧舜没后,圣人之道衰,纣时天下大乱,则周公相武王而伐之;当周末世道衰微时,孔子作《春秋》以治罪。所以孟子说“圣王不作”,自然也包括孔子在内,并且他们都兴起于乱世而关乎治乱。又,《滕文公下》,孟子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据此言,孔子作《春秋》类乎禹治洪水与周公平乱,则孔子自然也是圣王。⑤《离娄下》,孟子同样将孔子作《春秋》视为圣王的显德行,如同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纳贤,文王爱民,武王柔远能迩,以及周公思兼三王而行施四事。所以朱熹说:“此又承上章历叙群圣,因以孔子之事继之,而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故特言之”。⑥ 当然更为直接的证据见诸《孟子·尽心下》:

>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

① 班固:《汉书》,第1043页。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06、340页。
③ 皮锡瑞撰,张金平校注:《经学通论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15页。
④ 诸说见焦循《孟子正义》,第453—455页。
⑤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73页。
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5页。

> 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 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①

在这段文字中,孟子分出了两类人,即圣王及其见、闻者。尧、舜,其见而知之者禹、皋陶,其闻而知之者汤; 汤,其见而知之者伊尹、莱朱,其闻而知之文王; 文王,其见而知之者太公望、散宜生,其闻而知之者孔子。在前两组对比排列中,圣王的“见而知之者”为圣王辅佐,“闻而知之者”为继承天命者。这其中只有“禹”是个特例,他虽然同时也是舜的继任者,但不符合“五百余年”这一时间规律。据此而论,作为文王“闻而知之者”的孔子自然是文王的继承者。不仅如此,孟子感慨“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 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似乎有以孔子的“见而知之者”自居之意。林之奇谓“孟子言孔子至今时未远,邹鲁相去又近,然而已无有见而知之者矣; 则五百余岁之后,又岂复有闻而知之者乎”,恐非是。故朱熹曰: “此言,虽若不敢自谓已得其传,而忧后世遂失其传,然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而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指深哉!”②朱熹此言可谓体贴入微,得孟子之心。《孟子·公孙丑下》:

>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 “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 “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吾何为不豫哉?”③

孟子于此再次言及“五百年”这一话题,其所谓“七百余岁”,又曰“舍我其谁”,并非说他自己是当“五百年”之天命的王者,而是自信作为“见而知之者”能弘大孔子的学说。就如同《滕文公下》,孟子谓禹治洪水以佐尧舜,周公诛纣伐奄以相武王,其本人则拒杨墨、放淫辞以弘孔子之道。所以孟子始终以孔子为应“五百年”或“五百余年”天道承担者,而他本人或是“见而知之”的贤人,能广大孔子之道,我们在《孟子》中随处可以见到这样的自信。

总之,孟子认为孔子有“天子”之圣德。孟子之所以有此判断,应该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 一曰天道,一曰圣德。

先谈天道。天道本指天运行之道,是一道德化数术名词。《孟子·离娄下》“天下之言性”章: “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涉及历法推算,大意是说,天虽高,星辰虽远,但按照它的运动轨迹推算,即便是千岁之久,其日至等常度皆唾手可得之。这说明孟子时代,历法已然非常发达,人们对历算也充满了自信。事实上,孟子的自信并非痴人痴语。战国时期人们对于五大行星会合周期的运算已然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甘石星经》对于木星会合周期的运算相差不过一天,而马王堆《五星占》给出的金星会合周期的误差更是小于 0.5 天。④ 而古人对于天文星象的关注除了运用于农业生产等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便是星占。上两引孟子语都提到了“五百年”这个数字,其依据或与星占学有关。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 “木星、土星和火星每隔 516.33 年会合一次,《孟子》所谓五百年必有圣人出的周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中国古时很注意观察五行的‘合’和‘蚀’(又叫作‘入’)。”⑤持相同意见的还有班大为,他也将孟子说的“五百年”和三星聚合相关联。⑥

---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376—377 页。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377 页。
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250 页。
④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50—151 页。
⑤ 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分册《天学》,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563 页。
⑥ 班大为著,徐凤先译:《中国上古史实揭秘》,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1 页。

诚然,中国人特别注意观察五星汇聚,并把特异的星象和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政治治乱联系起来。如《新唐书·历三上》引《洪范传》曰:“历记始于颛顼上元太始阏蒙摄提格之岁,毕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营室五度。”①黄一农根据天象运行回推,发现公元前 2449 年水、火、木、土四星聚于娄、胃、昴三宿。② 又如,《竹书纪年》记载夏桀十年,“五行错行,中夜星陨如雨”。班大为推算这一天象发生在公元前 1576 年 11 月 7 日到 12 月 17 日这个时间段内,五星交错运行。公元前 1575 年,汤受命称王,21 年后的公元前 1555 年商汤灭夏。③ 对此,黄一农、徐振韬、席泽宗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④ 但相比而言,班大为的结论或更具说服力。最为重要的一次五星聚合见于《竹书纪年》、皇甫谧《帝王世纪》以及纬书《春秋元命苞》,文曰“殷纣之时,五星聚于房”。⑤ 班大为推断这一天象发生于公元前 1059 年,公元前 1058 年文王受命称王。⑥ 而黄一农推算这一年五星非聚于房,而是井、鬼附近。⑦ 即便真如黄一农所推算,极有可能是周人将五星汇聚的星宿由井、鬼改为房。《国语·周语下》:

>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逄公之所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⑧

“天驷”即房宿,“辰马”即房星和心星,房星为农象,房星晨正则农事起。周人是农业部落,以农德应世,故以房宿为自己受命之征。

孟子时代,上述种种传说自非秘闻。而它们对数次“五星聚合”的推算,大抵合乎孟子所云“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但如何理解孟子所谓“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的说法呢?因为从文王受命至孔子“获麟”,时间近 600 年,与孟子所说不合。但以“获麟”是孔子受命符瑞的说法产生较晚,至少孟子时代尚无这一说法。孟子或以孔子作《春秋》为依据推算的,并且孟子时代关于孔子作《春秋》的叙述也应该和汉代经学家的说法不同。总之,“五百年”作为一种数字概念或数字信仰对孟子产生了极大影响,并成为其关于孔子受天命承继文王的天道依据。

孟子相信王爵得自天,而非得自人。《万章上》:

>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⑨

所以孟子认为孔子乃受天命者,其位得自天。而当他说“《春秋》,天子之事”,重点强调的是,孔子是天之子,而非仅仅是世俗意义的帝王。“天”既有神秘性,又有道德属性,这都凝聚于孔子所作《春秋》之中。

再谈圣德。孔子承续先圣,尤其推崇文王之德。《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

①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602—603 页。

② 黄一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4—55 页。

③ 班大为著,徐凤先译:《中国上古史实揭秘》,第 41—52 页。

④ Huang Y L., “A Study on Five-planet Conjuncions in Chinese History,” *Early China*, 15, 1990, pp. 77-122. 徐振韬、蒋窈窕:《五星聚合与夏商周年代学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9 页。席泽宗:《五行错行与夏商分界》,《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92—694 页。

⑤ 皇甫谧《帝王世纪》,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28 页。《竹书纪年集解》,上海:广益书局 1936 年版,第 73 页。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184 页。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406 页。

⑥ 班大为著,徐凤先译:《中国上古史实揭秘》,第 10—17 页。

⑦ 黄一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第 59 页。

⑧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123—125 页。

⑨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307 页。

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朱熹: “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不曰道而曰文,亦谦辞也。”①实则文为德之总名,见《周语下》。② 孔子曰“斯文在兹”,其意或有二: 一是继承文王之德,二是王德在我的自觉与自信。故《孟子》处处以文王、孔子作比。文王“发政施仁”,以治践仁(《梁惠王下》);孔子“学不厌”“教不倦”,以教践仁(《公孙丑上》)。文王以百里称王,孔子亦可“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公孙丑上》)。文王以德行仁故天下服,孔子亦“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公孙丑上》)。“士憎兹多口,《诗》云: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文王也”(《尽心下》)。此谓文王能以道理其心,虽谗口嚣嚣亦不陨损其声闻,孔子亦然。又,设若孔子为王治天下,亦当如文王。故孟子论治民,引孔子语: “道二: 仁与不仁而已矣。”设若论天下有道,曰“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举文王为例,曰“帅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又引孔子话“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以证之。实际上,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王者”也可以看作是文王,至少主要指文王,因为《孟子》谈《诗》多是结合文王行事及德行来展开。

是故在孟子看来,孔子无疑是文王、周公之后的圣人典范。他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时即中庸,“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可以处则处,可以仕则仕”,故为德之大者,亦即“集大成者”:

> 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 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 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集大成乃合汇众乐之小成为一大成,以譬喻孔子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③ 很有趣的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孔子之谓集大成”时引了汉儒兒宽“惟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④《汉书》本传中,兒宽的话还有两句,即“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⑤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孟子“《春秋》,天子之事”语,据此,朱熹似乎赞成孟子以“孔子为圣王”的表述。

孔子既得天时,又有圣德,合之便为有天德者。有德者有位,亦当受命建新朝,故孟子以孔子为圣王。这在近出的简、帛《五行》中有清晰表达。郭店简《五行》:

> 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也。知而行之,义也。行之而时,德也。见贤人,明也。见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而敬之,礼也。圣,智、礼、乐之所由生也,五□□□□也。和则乐,乐则有德,有德则邦家与。文王之见也如此。“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此之谓也。⑥

简帛《五行》是思孟学派的作品,也就是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判的文本。故而可将《五行》对孔子的圣王化与《中庸》《孟子》对读。就上述引文而言,其所谓“闻而知之,圣也”“行之而时,德也”都和《孟子》的表达吻合。值得注意的是,《五行》中也有“金声”“玉振”的内容,并且特别强调“金声玉振”是德的表现,而且是天德。我们甚至认为《五行》实际上就是子思、孟子比照着孔子作出的表述,表彰孔子是有天德知天道的圣人,阐发孔子生于周代的末世应该创建新朝的思想观念。取代殷朝而建立周朝的文王正是受命于天,并完成这一过程。因而成为孔子最佳的榜样,所以无论是《孟子》还是《五行》,处处都拿文王作为例证。同样,作为孟子私淑师的子思在《中庸》中,描述了孔子受挫后膺受天命,达成再次上升的意图,作为无冕之素王君临天下。其治理天下的状态正是“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

---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110 页。
②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 88—89 页。
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315 页。
④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315 页。
⑤ 班固:《汉书》,第 2631 页。
⑥ 荆门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0 页。

而世为天下则”(第 29 章),孔子的行为言辞可直接作为天下的标准和法则,因此无须天子的地位和制礼作乐的具体形式。因此,浅野裕一认为《中庸》描述了孔子从卑微至于君临天下的成圣轨迹。① 而《中庸》《孟子》以及《五行》中充溢的神秘色彩,应该是思、孟学说的底色。

以上我们围绕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在我们看来,它既非历史学问题,亦非文献学问题,尤其不是《诗》与诗学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从知识背景和思想史意义角度切入研讨的问题。这涉及孔子圣化问题。孟子以历数推演天命,言圣德当建新朝。故孔子上接文王,以《春秋》承续《诗》,此正是“斯文在兹”之事。孟子言《春秋》为“天子之事”,其本意当然不是指孔子为现实的天子,而是强调孔子以《春秋》传达天命的合法性。汉儒以孔子为素王,纬书大谈玄圣素王,实肇端于孟子。思孟学派的神秘主义色彩,阴阳家与思孟学派的关系,以及其隐含的知识体系和思想史脉络,则值得我们进一步深究。②

Text and Heavenly Way: the Knowledge and Thought of Mencius's Statement that Confucius Composed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ao Jianguo

(*Lu X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 *China*)

Abstract: In *Lilou* II, *Mencius* (《孟子·离娄下》), Mencius said that as the king's system of folk song collection was abolished, songs were no longer be made, and then there appeared the composition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Scholars through the ages discussed this problem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In actuality, this proposition was neither an issue of history, nor an issue of philology. Especially it was not an issue of *Book of Songs* or poetics, but a proposi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concerning the sanctification of Confucius. Mencius used the calendar system to deduce the Mandate of Heaven (天命), and firmly believed that a new dynasty should be built by a sage of virtue. Confucius was such a temporizer, whose virtue was inherited from King Wen of Zhou (文王), and who succeeded the tradi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with his composition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is was* exactly where Confucius's discourses and statements were (斯文在兹). When Mencius said that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as “the work of the Son of Heaven,” his intention was not, of course, to refer to Confucius as the real Son of Heaven, but rather to emphasize the legitimacy of Confucius's use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o convey the Mandate of Heaven. What i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is that many of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propositions put forward by Mencius and other scholar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the arts and crafts “as the foundation and background,” reflecting the uniqueness of the early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values.

Key words: the withering away of *the Book of Songs* (《诗》亡); Confucius Composed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孔子作《春秋》); text; heavenly way

(责任编辑 管 琴)

---

① 浅野裕一:《〈中庸〉“诚者天之道也”再考——以其与〈五行〉之关系为中心》,《饶宗颐国学院院刊》第 4 期,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7 年版,第 137—158 页。

② 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认为驺衍为孟子后学(《史记》,第 2343 页)。蒙文通《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认为汉代齐学革命、禅让以及素王学说与孟子“诛放”精神一贯(蒙文通:《经学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2—182 页)。李泽厚认为董仲舒作《春秋繁露》,把儒家的基本伦理观念和阴阳家的宇宙论结合起来,构建一种新型的宇宙图式,也就是所谓的“天人宇宙图式”(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155 页)。